

森鸥外文学中的近代化书写

——《半日》《修建中》论

林 敏

摘 要: 近代化书写是森鸥外文学的一大创作主题。作为兼具东西方文化视野的近代文豪,森鸥外在文学表达中一贯坚持尝试寻找东西方价值观的结合点,通过调和东西方文化的矛盾积极探索日本近代化模式,其作品聚焦封建与近代、保守与进步、秩序与个体等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突出矛盾,体现出知识人对社会的自觉思考和文学的时代关照。步入创作丰硕期后的森鸥外文学在拓展初期主题的同时,表现方法上有了较大的变化,较之初期作品的感伤性与抒情性,中后期作品则表现出冷峻的凝视、理性的写实与批判的精神,《半日》《修建中》中鲜明地体现出这种转变特征。在两部作品中森鸥外运用高超的象征性叙事揭示了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困境与矛盾,他将新旧价值观的问题、先进与落后的问题、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问题等日本近代化进程中需要超越的重要课题统摄于两作中,从文学层面为在近代化困境中挣扎的近代日本人提供了反思的视角。其对近代化进程所进行的理性思考与批判性书写,正是时代的迫切性与作家个体的自觉性催生的产物。

关键词: 森鸥外;近代化;《半日》;《修建中》;批判精神

中图分类号: I313.07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0766 (2023) 04-0043-08

在《鼎轩先生》一文中,森鸥外将近代日本文明开化论的积极倡导者田口卯吉比作“两条腿走路”的学者,指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在近代新日本交汇并卷起旋涡,于是出现立足于东方文化的学者和立足于西方文化的学者,然而两者皆为单脚而立,……时代要求两条腿走路的学者,要求一只脚站在东方,一只脚立于西方的学者”。^① 笔者以为,森鸥外对田口卯吉的定位可以原封不动地用以评价近代文豪森鸥外本人。在近代日本文学界,兼备东西方学问的大家屈指可数,森鸥外堪称其中一员,其思想有两个核心的支撑点,一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东洋思想,二是以个人主义价值观为中心的西方思想。关于这一点,学界多有论及,这也成为开展森鸥外研究的共识与基础。

出身藩医世家的森鸥外(1862—1922)自幼学习儒家经典,汉学修养积淀深厚,儒家思想培养了他的功名意识和家国情怀,青少年时期在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培育了他的科学精神,近四年的德国留学经历更使他对西方文化有了直观的认知。在西方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森鸥外开始从“非我之我”中觉醒,逐步意识到内心深处压抑已久的“真正自我”,^② “西欧自由的空气在他儒学的骨骼上赋予了近代自我觉醒意识与合理主义精神以及实证方法论的血肉”。^③ 在德国期间,森鸥外除了接受卫生学等专业训练,还广泛吸收西欧文学、美学、哲学等领域的知识,尤其是叔本华、尼采、哈特曼等人的哲学思想对他影响深刻。渊博的东西方学识为森鸥外的文学构筑起坚实的思想基础,也决定了他不曾放弃对东西方文化的探索,并终生致力于调和日本近代化进程中两者的矛盾。

作者简介: 林敏,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成都 610207)

① 森鸥外『鼎軒先生』、『日本現代文学(7) 森鷗外集』、講談社、1973年、403-404頁。

② 森鷗外『舞姫』、『日本の文学(2) 森鷗外(1)』、中央公論社、1966年、9頁。

③ 長谷川泉『長谷川泉著作選(1) 森鷗外論考』、明治書院、1991年、112頁。

1909年是森鸥外文学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一年,经历“小仓左迁”^①之后,他重返文坛并步入创作“丰硕时期”。由此,森鸥外的文学在拓展、深化初期主题的同时,表现方法上有了较大的突破。较之初期作品《舞姬》(1890)《泡沫记》(1890)等流露出的感伤性与抒情性,1909年之后的创作则鲜明地表现出冷峻的凝视、理性的写实与批判的精神。此期的森鸥外将自己对社会的思考投射进作品中,运用象征性的叙事手法创作出一系列聚焦封建与近代、保守与进步、秩序与个体等反映东西方文化冲突以及近代化进程中的突出矛盾的作品。在《半日》(1909)、《青年》(1910)、《修建中》(1910)、《妄想》(1911)、《雁》(1911)、《灰烬》(1911)等系列作品中,他对近代日本大变革时期的社会图景进行了多维度描写,反映了明治知识人对社会与时代的自觉思考,更体现出森鸥外文学特有的思想价值。东西方文化调和的问题是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将围绕《半日》《修建中》的创作主题与表现方法,结合森鸥外“精神上的自传”^②作品《妄想》,探析这位兼具东西方文化视野、“两条腿走路”的近代文学开拓者对日本近代化问题的理性思考,以及从思想文化层面为推动近代化发展所进行的积极探索。

一、《半日》中的近代困惑

1909年3月,重返文坛的森鸥外在同年创刊的文艺杂志《昂》上发表了第一篇脱离雅文体、使用现代口语创作的小说《半日》。^③日本文学评论界对该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甚至将其视为“森鸥外的第二处女作”。^④从叙事的外部视角考察,该小说是一篇描写家庭内部婆媳纷争的作品,其内容甚至可以联想到森鸥外自身家庭内部的真实状况,表现出私小说的色彩。因而,在日本文学评论界,将之与当时处于鼎盛时期的自然主义文学置于同一视野进行的研究也为数不少。^⑤然而,如果仅仅将小说视为反映世间婆媳纷争的典型作品,或者是森鸥外自曝家庭隐私的作品,则无助于理解森鸥外的文学观及其文学思想的特质。作品是作者思想的投射,作为一名具有思想高度的作家,森鸥外对于文学的时代使命有充分的认识,他的小说创作带有明确的“意图”性,也正是这种“有意识地创作”^⑥思想赋予了森鸥外文学极富象征性的书写特征,而了解这一特征是深入解读《半日》创作主题的关键。

顾名思义,《半日》所写即半日中发生的故事。留学归国的文学教授高山博士家长期以来在母亲的操持下维持着既有的秩序,“近代的‘侵入’未在这个和谐的家庭中掀起任何波澜”。^⑦然而,自博士迎娶了大审院院长的女儿之后,家中失去既有的平衡。在博士眼里,妻子是一位重视个人感受,大胆表达自我主张的女性。比如,她从不称呼博士的母亲为母亲,只称“她”,理由是“自己是来给丈夫做妻子的,不是来给母亲做女儿的”,“她甚至从来不与母亲同席而坐”,还明确向博士表示“我不喜欢跟你母亲一起外出,请你不要让我做我不喜欢的事情”。

博士的母亲性格刚毅,是家中的主宰者。为鞭策儿子出人头地,她节衣缩食、任劳任怨,在儿子

① 1899年,森鸥外因与上司发生龃龉,被派到北九州的小仓,度过了3年,此期被称为“小仓左迁”时期。

② 浅井清等編集『新研究資料 現代日本文学(第1卷) 小説・戯曲(Ⅰ)』、明治書院、2000年、128頁。

③ 森鸥外『半日』、『鴉外選集』第1卷、岩波書店、1978年。后文中出现的有关《半日》的引文皆出自于此。引文皆为笔者译。

④ 蒲生芳郎「〈半日〉の問題——鴉外文学の轉換」、『日本近代文学』、日本近代文学会編集委員会編、1970年、23-36頁;水本精一郎「〈豊熟の時代〉の原基——森鸥外〈半日〉とリルケ」、『日本文学』41(10)、日本文学協会編、1992年、70-74頁。

⑤ 小堀桂一郎「解説 鴉外の創作(1)」、『鴉外選集』第1卷、354頁;三好行雄「鴉外の〈私小説〉——〈半日〉をめぐる」、『吉田精一博士古希記念 日本の近代文学 作家と作品』、角川書店、1978年、71-77頁;山崎国紀「〈半日〉の構造——その擬装性と〈追儼〉の意味」、『森鸥外研究(1)』、和泉書院、1987年、121-145頁。

⑥ 森鸥外『あそび』、『日本の文学(2) 森鸥外(1)』、343頁。在作品《游戏》中,森鸥外借主人公木村与同事的对话,简洁地回答了创作“不是靠本能”而是“有意识地创作”的思想。

⑦ 田中実「先導者としての森鸥外・覚え書——〈半日〉〈仮面〉〈追儼〉のころ」、『国文学論考』通号17、1981年、4頁。

功成名就之后，又替儿子掌管财产、料理日常家务，每日早早起床，亲自为儿子烧水做饭。妻子则抱怨母亲过多地干预丈夫的生活，更不满母亲对家中财产的掌控。她认为，钱是博士挣来的，理应由作为妻子的自己来掌管。可是，母亲却坚信“自己管家对整个家庭有利，不让自己管是不妥当的”，继续把持对家庭的控制，婆媳对立日渐加深。

高山博士是一位做事循规蹈矩，连洗漱都“像茶道仪式”一般井然有序的人。由于深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他深感父母有恩于己，理当以孝回报，因而不愿违背母亲的意愿，认为“母亲管家是既成事实，妻子想要硬抢实为不妥”，表现出顺应既有秩序的一面。另一方面，高山博士又是一位接受过西方思想教育的知识人，对于妻子争取正当权利的主张，他缺乏从根本上否定的理由。

江户时代，在传统的父权家长制束缚下，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被规定为“顺妻”“孝媳”。明治维新后，明治政府提出“破旧有之陋习”“求智识于世界”，^①拉开了近代化改革的大幕。随着“文明开化”的实施，明治社会掀起了一股学习西方思想文明的浪潮，以福泽谕吉、森有礼为首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在《劝学篇》（1872—1876）、《妻妾论》（1874）等著作中大力倡导男女平权，提出新的婚姻关系的原则，对以父权家长制为核心的封建家庭伦理展开了批判。

博士的妻子想要知晓和管理家中的财产，其主张反映了明治维新后受西方价值观影响的新群体对个人价值、个人权力的认知。在婚姻观上，妻子也有“新”的想法，认为“自己是来给丈夫做妻子的，不是来给母亲做女儿的”，反映了“在明治中期浪漫主义思潮中度过青春期”^②的新群体对建立在夫妇爱情之上的婚姻的追求。妻子对母亲的挑战，象征性地表现了具有新观念、新人格的近代新群体对母亲所代表的封建家长制权威、秩序的挑战。

博士认为，与传统的母亲相比，妻子的言行具有颇多令人费解之处。比如，她全然不顾他人立场、毫不遮掩自我欲望，也从来“不会为任何事情尽心尽力，丝毫没有克己之心”。与此相反，作为婆媳纷争的另一方，母亲却从不直接阐述自己的观点，只是默默地面对现实，尽心竭力地操持家务，体现出传统女性忍辱负重的特征。最后，博士以“孝”为标尺，审视妻子的行为：“在拥有浓厚的‘孝’观念的国度里，怎么会有像妻子那样满不在乎地在丈夫面前说出对婆婆不恭敬的话的女人呢？”在博士看来，“即便从西洋的观念来看，母亲也是非常神圣的，没有哪个女人会认为可以在丈夫面前侮辱婆婆。不用说东西方的历史上，就是小说和剧本里也找不出像我妻子这样的女人”。最终，他将妻子的行为归结为“一切评价标准都在发生变化的当今这个时代所特有的产物”。在《半日》的结尾部分，森鸥外借博士之口巧妙地将“孝”的问题与新旧思想交织更迭的时代进行了关联。

如同尝试调和却又无从调和母亲与妻子的矛盾那样，作为一个生活在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期的知识分子，森鸥外也在东西方价值观冲突的时代中困惑徘徊，表现出“既承认以西方为媒介的近代化的必然性，又要在非近代的传统伦理中寻找近代化的支撑点”^③的矛盾心理。现实生活中的森鸥外与高山博士有较多的重合点，这是森鸥外研究学界众所周知的事实。森鸥外的母亲峰子是一位意志力极强的女性，在他的成长和仕途上一直严厉地鞭策和影响着他。森鸥外26岁从德国留学归国，28岁时奉母命与陆军中将的长女结婚，一年后离婚。1902年，40岁的森鸥外与比自己小18岁的大法官的女儿茂子再婚，但家中长期婆媳不和，纷争不断。《半日》中，生活在象征封建家长制权威的母亲与代表明治新群体的妻子矛盾对立中的高山博士，其苦恼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森鸥外自身的苦恼。

高山博士批评妻子个人主义思想太强烈，也认为她缺乏传统女性的忍辱负重与意志力。然而，笔者认为在《半日》中，森鸥外所关注的重点其实是博士妻子对于“孝”的行为意识，《半日》创作的意图与表现的主题正是以“孝”为切入点，提示出以“孝”为代表的传统道德体系在西方思想主导的日本近代化进程中何去何从的核心问题。在表现家庭内部婆媳纷争的喧嚣故事背后，隐藏着作者深刻的创作意图，即透过纷争的表象揭示日本近代化进程中封建与近代、东方与西方的突出矛盾，这

① 福尾猛市郎監修『日本史史料集成』、第一学習社、1972年、250頁。

② 菊地弘「半日」、『国文学 解釈と鑑賞』57(11)、至文堂編、1992年、76-78頁。

③ 加藤周一『鳴外とその時代』、『加藤周一自選集(2)』、岩波書店、2009年、320頁。

正是《半日》的文学意义之根本所在。

分析森鸥外的多部作品,可以窥见他对传统道德体系在近代化进程中的定位问题所做的深刻思考。在《半日》的开篇部分,他便借有恩于高山家的同乡某高官之口,提出了日本传统道德中的“养育”与“报答”的问题。高山博士的家境并不十分富裕,他能完成学业“全凭母亲节衣缩食、省吃俭用为博士提供学费”。后来,为了是否送博士出洋留学的问题,父亲请教了同乡高官。这位高官这样答复了父亲:“以你的收入,把儿子送进大学就已经不同寻常了。既然你们夫妇要齐心协力供他,我也不会阻拦,但这已经是在冒险了。这种冒险的做法来自于日本特有的老后依靠孩子的习俗,但我很难保证这是一件好事,至少不是一件稳妥的事。”竭尽全力供养孩子读书,将老后的依托寄托在出人头地的孩子身上,从传统观念来看,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是森鸥外却借高官的看法,对日本传统道德中以“报答”为前提的“养育”模式所具有的冒险性与非妥当性提出了质疑。

在大致同时期创作的被视为森鸥外“精神上的自传”作品《妄想》(1911)中,作为森鸥外化身的“老翁”也对封建道德桎梏个人思想的行为表示了怀疑。森家世代为津和野藩的藩医,森鸥外的父亲作为养子入赘,家中处支配地位的是母亲。母亲一心期盼长子出人头地,终生都在严厉地鞭策他“从一个勤奋的孩子,到一个勤奋的学生,从一个勤奋的官吏,到一个勤奋的留学生”,森鸥外感到自己“如同在舞台上扮演的一个角色”,“任人在背后鞭策、激励”。他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洗净涂着粉墨的脸,从舞台上走下来,静静地思考自我,看一眼在背后驱使自己的到底是何物”。然而,此刻,“舞台监督的鞭子又落了下来,自己只能一个角色一个角色地演下去”。^①接受过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熏陶的森鸥外虽然并非甘于扮演没有自我、被人支配的角色,但从小接受的“孝道”教育使他终身无法忤逆母亲以及母亲所代表的伦理与秩序的意志。一方面是追求西方自由思想与个人价值,从“非我之我”中觉醒,寻求“真正自我”的我,一方面是受传统伦理道德束缚,被人支配,“没有自我”的我,森鸥外心中同时存在的这两个自我,决定了他虽对封建伦理道德产生质疑,却终身无法彻底摆脱这种伦理道德的制约。

可见,《半日》中所揭示的“孝”的主题,对于森鸥外而言,并非突发奇想的问题,作品中对妻子有悖于“孝”的行为所进行的描写不过是他为阐述自己的思想寻找的契机。这一点,从他的译作《家常茶饭》中也可找到内在的关联。《半日》出版后的同年10月,森鸥外完成了对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戏剧作品《家常茶饭》的翻译。对于里尔克的《家常茶饭》,评论界的评价并不理想,认为它“不具备戏剧性,不足以用评价黑贝尔的标准去评价,也无易卜生作品的精雕细琢”。然而,对于这部不受世人好评的作品,森鸥外却从中发现了足以震撼自己的思想并有助于探索日本近代化模式的独特价值。他形容该作品“犹如在潜藏着无数光怪陆离的海面上荡漾的小小微波”,透过这“小小微波”,森鸥外窥探到了潜藏在深处的“光怪陆离”。那么,引起他强烈兴趣的“光怪陆离”的事物为何物呢?在《家常茶饭》附录的《现代思想》中,他明确阐述了自己在译作中“唯一想要强调”的重点:“既不是作品的主旨,也不是别的什么,而是故事中出现的一段小插曲——主人公画家的姐姐与其母亲的关系问题。”森鸥外坦言,如果仔细阅读作品中姐姐索菲与画家弟弟的一段对话,那么“我们所受到的那些‘孝道’教育便会被摧毁得无影无踪”。^②那段姐弟对话征引如下:

弟弟:姐姐你长年累月、从早到晚陪伴母亲,照顾母亲,……我很理解你的辛苦。

姐姐:其实,我照顾母亲并非出于旧观念所束缚的关系,……在我心中,早就与“母亲”道别了,我仅仅认为自己碰巧遇到了一位没有渊源关系的人,而那个人如果没有别人的帮助就很难活下去,我得帮助这样一位可怜的人。^③

在森鸥外看来,不惜牺牲自己的婚姻,也要一辈子照顾母亲的姐姐,如果用传统价值观中的

① 森鸥外『妄想』、『日本の文学(2) 森鸥外(1)』、351頁。

② 以上参见森鸥外『现代思想』、『森林太郎訳文集』第2卷、春陽堂、1922年、422、423頁。

③ 森鸥外訳『家常茶飯』、『森林太郎訳文集』第2卷、368-369頁。

“孝”的标准去评价，完全是个“了不起的孝子”。^①然而，姐姐却明确地回答自己的行为并非是出于“旧观念所束缚的关系”，而是“因袭关系之外”的原因。换言之，姐姐的行为跟传统的“孝”的伦理无关，它超出了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养育”与“报答”的框架，是一种用“孝道”的伦理无法阐释的行为。这种新的观念正是森鸥外在里尔克作品中发现的独特“价值”，也是他在《现代思想》中所阐述的让传统的“孝道”教育被“摧毁得无影无踪”的“光怪陆离”。

通过姐姐索菲的思想，森鸥外凝视了一个复杂、深刻的命题。东方文化中承袭千百年的“孝”的思想在西方文化中以另一种观念得到体现，其本身就是对“孝”作为唯一伦理标尺的质疑。索菲认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结成“不为旧观念所束缚的关系，才是更理想的关系”。索菲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森鸥外的共鸣，他认为这一思想符合近代社会追求人格独立的潮流，也认同建立在独立人格之上的个体与个体的关系，从《现代思想》中，可窥见森鸥外试图寻找东西方价值观的结合点，通过调和东西方文化的矛盾积极探索日本近代化模式的尝试。

综上所述，《半日》中母亲所象征的传统道德秩序面临妻子所代表的新观念的挑战，在东西方文化交织、传统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冲突的“一切评价标准都在发生变化”的近代日本，如何定位以“孝”为代表的传统道德体系，这正是森鸥外眼中家庭内部婆媳纷争的“小小微波”下潜藏的“光怪陆离”的重要课题。在东西方文化中“两条腿走路”的森鸥外对于《半日》中的妻子与母亲，并未进行全面的肯定或否定，而是通过冷峻的写实将两人在观念、行为上的差异如实地置于读者面前，促进近代日本社会对“新”与“旧”的合理性或非合理性的思考，借具象的日常反映超越日常的新旧秩序、观念、行为冲突的迫切现实，通过高山博士“小家庭”内部的矛盾，象征性地折射出日本近代化进程中明治“大家庭”的困境。在东西方思想冲突、新旧矛盾交织的时代浪潮里，森鸥外主动地将“我”投身其中，他对家庭隐私的暴露与私小说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笔者看来，森鸥外是以知识人高度的自觉和批判的精神，冷峻地凝视浓缩着社会矛盾的家庭纷争，通过理性的写实，探讨以“孝”为代表的传统道德体系在西方思想主导下的近代化进程中的定位，反映出近代知识人对近代化进程中东西方文化互融问题的独特思考。

二、《修建中》中的近代化路径思考

在《半日》发表后的第二年6月，森鸥外创作了反映日本近代化发展进程的短篇小说《修建中》（发表于《三田文学》）。^②这两篇小说的主人公都同为留学德国的归国者，与《半日》中的高山博士一样，在日本研究界，有较多的研究成果认为《修建中》中留德归国的渡边参事官身上也重叠了森鸥外自身的影子。^③

海军参事官渡边在东京遇见德国留学时的恋人、一位长着褐色眼睛的西洋女子，并邀请她在“精养轩”饭店共进晚餐。东京筑地的“精养轩”是明治初期在维新派元勋、政治家三条实美、岩仓具视的支持下创办的日本第一家西洋饭店，在欧化主义思潮席卷日本的“鹿鸣馆时代”^④接待过无数国内外政要名流，日语中，“精养”与“西洋”的发音相同，都是 seiyō。因此，森鸥外将故事的背景设在“精养轩”，其隐喻意义十分明显，即通过在近代日本文明开化中具有特殊地位的“精养轩”里发生的故事，象征性地揭示出日本在近代（西洋）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困境。

① 森鸥外『现代思想』、『森林太郎訳文集』第2卷、423頁。

② 原作标题为『普請中』，收于『现代日本文学大系7 森鸥外集（1）』、筑摩书房、1978年。后文中出现的有关《修建中》的引文皆出自于此。引文皆为笔者译。

③ 如，三島由紀夫『鴎外の短編小説』、『三島由紀夫評論全集』、新潮社、1966年；磯貝英夫編『鑑賞 日本現代文学（第1卷）森鸥外』、角川書店、1981年。

④ 指1883—1887年间日本欧化主义的顶峰时期。1883年日本政府为修订不平等条约而修建鹿鸣馆，政府官员与上流人士为接待外国使节频频在此举行宴会、舞会，营造融入西方社会的表象，鹿鸣馆亦被视为肤浅的欧化主义的象征。

小说在隐喻中开场,集中描写了晚餐前后数小时内所发生的故事,透过渡边参事官的视角可清晰地窥见日本知识人对近代化进程的思考。渡边参事官踏着“一路泥泞”,朝“精养轩”走去,“精养轩”开着两扇门,不知从哪扇门进去的参事官在迷茫中走进了入口。进入饭店后,他听到了一阵嘈杂的钉锤声、刨木声,原来“精养轩”正在进行改建。在渡边参事官眼里,“修建中”的“精养轩”呈现出怎样的状态呢?不知“向左还是向右”前行的参事官被一位“晃晃悠悠”走来的侍者模样的人引进了饭店里一个“朝东的房间”。在等待西洋女子到来的间隙,参事官环视了房间,只见墙上“像是随意凑到一块似地”挂着几幅梅花黄鹂图、浦岛太郎^①图之类的字画。字画都很短小,挂在西洋建筑高高的墙上显得十分不协调,“像是有半截被折起来”一样。餐室门两侧还挂着一幅某大教正^②手书的像是对联模样的“神代文字”。^③渡边参事官叹息道“日本非艺术之国”呀。

明治维新后,日本以建立独立自主的近代化国家为目标推动了近代化改革,试图通过学习西方而实现“万国对峙”的梦想,跻身资本主义强国之列。然而,通过侵略扩张取得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经历了四十余年近代化改革的日本,呈现出的却并非理想的状态。犹如留学归国的渡边参事官用西洋标准审视的“精养轩”一样,在这个象征着“文明开化”的场所里,艺术水准低劣、充斥着复古的气息,东西文化无序混杂,侍者缺乏文明教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皆与西方的标准相去甚远。展现在渡边参事官眼前的是一个杂乱无序的落后的日本,正如西洋女子所言,“日本还不行”。森鸥外通过西洋视角,借对正在改建中的“精养轩”内部的描写以及与西洋女子的对话象征性地表达了明治维新四十余年来日本近代化改革尚处在“修建中”的现实。

小说中,悲观地认识到日本近代化发展状况后的渡边参事官失落、苦涩、焦虑,在这样的心境中,他自然“没有等人的心绪”,只是盲目地吸着烟,试图用“身体上的愉悦”消除精神上的痛苦,在西洋女子到达时,他也只是“毫无意识地装出微笑”。席间,西洋女子提及两人曾经在德累斯顿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想要唤醒曾经的恋人对过往的回忆,然而自认为已经丢掉幻想、变成彻头彻尾的“实利主义者”的渡边参事官却对此视而不见,以“这里是日本”为由冷淡地拒绝了西洋女子,时间才过八点半,西洋女子怅然而归。从中可以看出,《修建中》的创作主题既是为了揭示和批判日本落后的状况,更是为了阐明明治知识人对近代化建设的态度。透过渡边参事官形象,读者仿佛可以看见在“西洋女子怅然而归”的背影后伫立着一位充满苦涩、焦虑却又冷静、坚定的明治知识人。当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无法回避地摆在眼前时,森鸥外选择了面对,他直面日本近代化发展的现状,并将其定位为正在“修建中”。虽然这是一个令人失落的现实,但他仍然对“修建后”的日本充满期许。

森鸥外将这一期许寄托在渡边参事官身上,表现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浸润、具有治国平天下志向的明治知识人主动参与国家近代化建设的决心。分析小说中的渡边参事官,可以窥见其思想所经历的三次变化。首先他从西洋标准的外部视角审视并批判了日本近代化发展的落后状况,在此认识之上,从日本内部的视角对学习西方进行了理性的思考,并最终让自己变成一个抛开幻想的“实利主义者”,投身于日本近代化“修建中”。在此,立足于东西方文化,“两条腿走路”的森鸥外对于如何学习西方做了相对化的阐释,理性地为日本近代化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把脉。相对化视野是体现森鸥外思想高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小说《修建中》中,多次出现富有象征意义的“相对化”描写。比如,在审视“精养轩”内部状况之前,渡边参事官的视线首先停留在了“精养轩”附近的河道对岸,一户人家的门口茫然地伫立着一位背着小孩的女子,在右侧道路的尽头,海军博物馆威严堂皇的红砖墙赫然入目,挡住了大半个视野。这个博物馆是日俄战争后,明治政府为夸示日本对外战争胜利于1908年修建。然而,与其“威严堂皇”相对的却是一位“茫然伫立”的弱女子以及“精养轩”内部

① 浦岛太郎是日本神话故事中的主人公,传说与化身海龟的龙宫仙女一起去了龙宫。

② 大教正是明治政府于1872年设置的宗教教导职最高官,1884年废止。

③ 传说在汉字传入之前,日本神话时代就已存在的文字,一般认为乃后人伪造。森鸥外在其1912年创作的《权当如此》中,试图通过主人公五条秀磨阐明“神话不是历史”的主题,对包括“神代文字”在内的神话与历史问题做了进一步探讨。

与西洋文明相去甚远的落后现实。当日本还沉浸在日俄战后膨胀起来的自负中时，途经乌拉基沃斯托克到达日本的西洋女子口中说出的却是“日本还不行”，西洋眼中的日本与日本的自我认识之间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在森鸥外眼里，国“强”民弱的问题、落后于西方文明的问题及对自身发展状况认知偏差的问题，都是近代化进程中需要探索的课题。

森鸥外所具有的相对化视野，也使他一直都反对盲目地追随西方。《修建中》中，到达“精养轩”后的西洋女子评价道“这里是个不安稳的地方”，接着又马上强调“反正我也一直没有安稳过”。东方文化中有“不安稳”的因素，西方文化中也存在“不安稳”的因素，隐喻中所体现的正是森鸥外对东西方文化的相对化认知。从德国归国后不久，森鸥外便因为反对盲目效仿西方建高楼、改良传统饮食习惯以及改良假名文字等问题，而被嘲讽为“保守的归国主义者”。批判肤浅的欧化主义思潮，这种理性务实的态度与他作为自然科学学者的实证主义精神有关，更与他的思想高度有关，在《妄想》中他曾坦言自己在欧洲“相逢了无数的师，却尚未遇到一个真正的主”。^①这是一种建立在辩证的相对化立场上的西方认知，反映了他对西方文化不盲从的态度。如同他在《鼎轩先生》一文中所强调的那样，“一条腿走路的学者，其意见是偏颇的，因为是偏颇的，所以一旦用于实践便会出现问题。听从东方学者的会过于保守，而听从西方学者的则会变得激进”，^②对于森鸥外而言，无论是对待社会现实，还是进行文学表达，他都一贯坚持尝试在东方与西方、保守与激进中寻找平衡，并将融合东西方文化视为日本近代化发展中的重要课题。

《修建中》中，渡边参事官与西洋女子相对而坐，他以“这里是日本”为由冷淡地拒绝了女子的亲吻和试图唤回过往的愿望，坦然地与女子告别。西洋女子远去的身影，暗含着渡边参事官不盲目追随西方的态度。“这里是日本”，是正在“修建中”的日本，这不但是渡边参事官对日本近代化进程的清醒认识，也是他反复念给自己的“紧箍咒”，字里行间透露出这位体验过西方文明的知识人面对落后的日本苦涩、焦虑的心境，同时也表现出他丢掉幻想，变成务实的“实利主义者”，参与适合日本自身的近代化建设的立场。近代评论家阿部次郎在评价《修建中》时曾指出该作在“贯穿全篇的冷漠寂寥中却有一种震撼读者心灵的精神气魄”。^③可以认为，渡边参事官投身日本近代化建设的立场中所体现的正是这种“精神气魄”。

《修建中》将故事的背景置于正在“修建中”的“精养轩”，突出了作品的时代隐喻。森鸥外运用高超的象征性叙事手法将作品的思想统摄在近代化正在“修建中”的主题上，小说中，传统叙事意义上的情节性虽不强，却在主题思想的统摄下，确保了作品的深层连贯性。对于森鸥外而言，东方文化是他的原生故乡，西方文化则是他的精神故乡。如同《修建中》的渡边参事官，作为接受过西方教育的近代知识人，他的价值标准无疑是倾向西方的。然而，作为学贯东西的知识人，他又并不盲目地一味倒向西方，而是站在相对化的高度塑造出既能清醒认识国家发展状况，又能将自己的使命置于国家建设的人物形象。森鸥外对日本近代化问题的自觉思考，体现出其高度的思想性和社会责任感，也使其无愧于“明治知识人的偶像”^④这一称号。

《半日》与《修建中》在创作主题与表现方法上具有诸多的共性。两作均聚焦社会现实，揭示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困境与矛盾，《半日》中所反映的个体与秩序的问题、新旧价值观的问题、传统道德体系在西方思想主导的近代化进程中何去何从的问题，以及《修建中》所表现的先进与落后的问题、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问题、近代化发展路径的问题，都是日本近代化进程中需要超越的重要课题。“明治时代是一个暴力的进程，所有的人都被撕裂得一分为二，越是直面问题，便越深陷苦恼，近代的日本知识人扭曲、痛苦，谁也逃不出被撕裂的命运”。^⑤森鸥外正是在这种时代的困惑中思索、

① 以上参见森鸥外『妄想』、『日本の文学（2）森鸥外（1）』、356、360頁。

② 森鸥外『鼎軒先生』、『日本現代文学（7）森鸥外集』、404頁。

③ 阿部次郎『六月の小説』、『阿部次郎全集』第12卷、角川書店、1962年、141頁。

④ 三島由紀夫『解説』、『日本の文学（2）森鸥外（1）』、530頁。

⑤ 秋山駿『評伝の解説』、『現代日本の文学（2）森鸥外集』、学習研究社、1978年、426-427頁。

前行，他以构建在深邃的思想性之上的批判精神，运用高超的象征性书写，为在近代化困境中挣扎的近代日本人提供了反思的视角。

在表现方法上，作为具有转折意义的作品，两作中的表现方法均与初期作品形成鲜明的对比。《舞姬》《泡沫记》《信使》等作品中强烈的情感性倾诉与抒情性描写在《半日》《修建中》中已不复再现，取而代之的是冷峻、理性与透彻的写实。在《修建中》发表的同月，评论家阿部次郎便敏锐、准确地捕捉到了森鸥外文风的巨大变化，他在《六月的小说》中感叹作者的“冷峻”，直言“一想到《舞姬》的作者变成了《修建中》的作者，不禁唏嘘人生的寂寞”。^①用冷峻与理性替代伤感与抒情，毋庸置疑，森鸥外文学表现方法上的变化折射出的是他内心世界的变化，其对近代化进程所进行的理性的思考与批判性的书写，正是时代的迫切性与作家个体的自觉性催生的产物。

结 语

综观森鸥外的文学作品，可以发现他十分擅长利用身边的素材，借作品倾诉自我思想，抒发自我对外部世界的感受，且书写形式多样。他的小说风格简洁明晰，登场人物虽不多，但诸多作品中都或多或少透出作者自身的生活或精神痕迹，如《舞姬》中的丰太郎、《半日》中的高山博士、《修建中》中的渡边参事官、《妄想》中的老翁、《权当如此》中的秀磨等。然而，这些作品却与如实表现自我、以暴露隐私获得自我救赎的自然主义“私小说”有本质的区别。《半日》与《修建中》创作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鼎盛时期，与自然主义文学家一样，森鸥外也握着一把解剖用的“手术刀”，尝试“解剖”自身，“解剖”社会。然而，两者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前者“无理想、无解决”的立场与后者“有理想、有解决”的态度，正如三岛由纪夫所指出的那样，“森鸥外从自己的家庭内部中体会到的是近代日本的失败感，《半日》世界中的激烈残酷远非自然主义文学那些贫瘠的故事所能比拟”。^②如前文所论，《半日》与《修建中》都不仅在于解剖、揭示，更在于试图调和与解决，这正是森鸥外文学因其思想的高度超越自然主义文学的根本所在。

明治维新这场西方思想主导下的资本主义改良运动，给日本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与此同时，以个人主义价值观为中心的西方思想也给传统伦理根深蒂固的日本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封建与近代、保守与进步、秩序与个体，日本在革新与变迁的过程中始终无法摆脱此种新旧价值观对峙的困境，在近代化道路上面临或盲目或理性的艰难选择。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一批对西方文化有着理性认知的文学家试图从文学层面为日本探索出一条理想的近代化道路，如幸田露伴通过一系列的工匠书写发掘传统工匠精神的文化价值和时代意义，以此抗衡当时极端的欧化主义思潮，尝试从传统工匠群像中提炼出能支撑日本近代化发展的国民精神；夏目漱石也通过刻画时代转型期青年知识分子群像的困顿与迷茫以及个人主义与传统道德的冲突，试图探索理想的近代化模式。他们虽然关注的角度各有不同，但在自明治维新之后的近代化进程中，文学家对日本近代化道路的反思与探索始终未曾停止。

作为与夏目漱石齐名的近代文豪，森鸥外幼年接受系统的儒学教育，青年时期留学德国，这使他既具有传统士大夫的担当与抱负，又具有理性务实的实证主义精神，他游走于东方与西方文化之间，不仅从宏观视野认知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更从微观层面剖析这种差异所导致的社会问题。通过以《半日》《修建中》为代表的一系列建构在对社会与时代深刻认知上的作品，他用富于象征性的手法描绘出在东西方文化激烈冲突中艰难前行的日本近代化进程，揭示出为了探寻东西文化兼容并蓄的近代化道路，“欲以西方文化之眼观察东方文化，欲取彼之长以补我之不足”^③的近代化书写之意义。

（责任编辑：庞 礴）

① 阿部次郎『六月の小説』、『阿部次郎全集』第12卷、141頁。

② 三島由紀夫『解説』、『日本の文学（2）森鷗外（1）』、538頁。

③ 森鷗外『鼎軒先生』、『日本現代文学（7）森鷗外集』、404頁。